

抗战前后会城的小学教育

李达生

一、抗战前后会城小学教育概略

新会的文化教育事业，向来是较为发达的。会城镇抗战前几年就有县立小学七间（县立一小、二小、三小、四小、六小、十小、师范附小），私立小学将达50间。计有平山、文懿、瑞成、象泉、城东、善培、南洋、伟武、俊伟、江南、冈秀、薰尧、环溪、时中、古冈、永思、明智、广智、育才、永存、澄波、蔚霞、惠吾、有元、光华、华英、殷浦、崇真、达人、公余、廷芳、西墩、互助、植英、精英、慎阅、德新、宏才、文化、平民、文华、蕴华、祚祥、文澜、涌芬、泽仁、新民学园，区一女小，还有鹤鸣国民专修学校，和专教珠算的习成堂等，分布于城里城外，仅五显冲两岸就有小学六七间之多，真是学校林立。

抗日战争的炮火到达会城，六间县立小学和私立平山小学都在事前疏散到农村，二小在崖西京背，三小在双水塔岭、四小在司前石步、五小在牛湾六堡、六小在罗坑笋岭、十小和平山同在双水上凌，其他小学多随着江会沦陷而停办。在日敌统治下继续上课，执行汉奸奴化教育的是极少数。

抗战后期，一九四三年一月各县立小学奉命改制称为乡中心国民学校，我县原迁农村的六间小学一切校具设备都已移交所在地乡公所接办，胜利后会城的公立小学，是接收沦陷期间日伪小学开办、计有会城镇中心国民学校一间（在金紫街，现人民医院址，校长冯铁梅），和保国民学校四间，四八年以教育经费不足为理由，缩减为三间，第一保校在（五

显冲，现创新中学校址，校长何伯钊）、第二保校（在募兴路，现时代服装厂址，校长黎世泉）、第三保校在（镇前路现镇人民政府，校长何荣汉）。

私立小学先后复办和创办的有：平山（校长李钦）、文懿（在尚书坊，现实验小学校址，校长何国琮）、葵风（在知政中路现东方红中学校址，校长陈丽荷）、象泉（在南宁街、现实验幼儿园园址，校长莫仲琳）、瑞成（在景行里，现粮局宿舍大楼，校长李仪可）、侨光（在爵芳巷现东方红校址，校长陈柏坚）、崇真在（东门市现朝阳小学校址、校长莫荣坊）、殷浦（在古榕台，现南宁幼儿园附近，校长林殷浦）、广智（在五显冲，现创新中学右侧课室，校长刘伯皋）达人（在凤池里，现新民小学校址，校长陈嘉荣）、祚祥（在金紫街冯公祠内，校长冯天祥）、植英在（金刚地，现电机厂地方，校长谭惠）、精英（在炒米街，现敬老院址，校长钟宝瑜）德新（在民生路，现机关幼儿园、校长练德和）、致用（在西隅路，现会城副食批发部，校长黎昌）、崇实（在诗书街，校长林日章）、青年（在深冲桥，现县招待所址，校长钟宇宋），群英（在环溪庙，校长梁永年），仁义（在金刚地，现医疗器械厂，校长钟载贤）、励志在如求社，校长陈国材、新生（在环堂里，校长罗吉谋）、培新（在东澜里、校长梁鹤畴）、华英（在河南路，校长王东荫）、坤德（在骑虎关、校长谢秉桃）等20多间。

据四九年一月前新会县政府公布全县（包括江门）小学教育情况：有中心国民学校116间，学生30011人，保国民学校263间，学生26971人，幼稚园4间，幼稚生280人，民众学校3间，学生264人。私立小学28间，学生6617人。

光复后国民党政府提出一保一校的口号。新会全县有

1211个保，到四九年保国民学校只得263间。会城镇是县治所在地，文化教育的中心，全镇划分16个保，而保国民学校也仅得三间。从此可见国民党政府所谓发展公办教育事业的政绩了。

会城私立小学在数量上比抗战前减少，有的在质量上相当好，在培育人材，对地方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被会城人民所称赞。私立学校经费的来源可分为五类：①华侨捐资开办的有平山、侨光；②姓氏封建祖尝兴办的有何姓的文懿、莫姓的象泉、李姓的瑞成等；③中华基督教会办的有崇真；④中共地下组织联系教育知名人士集资创办的有葵风，它们都有一定的办学经费，教学设备，师资素质也较好。⑤还有一些独资或合伙以办学为生计的所谓“学店”。

四八年十二月间广东省教育厅督学冯少杜来新会视察，由县督学张明晖陪同先后到会城葵风，文懿，平山三间私立小学，和镇中心学校及一、二、三保校视察后说：“新会教育事业尚称蓬勃”这句话，就是当时官方下的结论，表示满意了！

二、公立小学官场化私立小学商业化

抗战胜利后我县公立学校受县政局人事变迁的影响，特别严重的，县长更换，校长也随着下台。校长更换，教师非有特殊关系，很少能继续留任。所谓清高的教育部门，也是一朝官府一朝臣。如会城镇中心国民学校，在胜利后四年多的时间就更更换了五位校长，先后有莫景耀（后台是莫朝英和英朝雄），蒋惠浦（县长汤灿华指派）、莫国宝（会城镇长兼），何汝倬（会城镇长兼）、冯铁梅（国民党县党部监察

委员及县参议员)。至如保国民学校的校长，也没有一个能连任几年的。因而公立学校的校长也视学校为他个人混入官场的前进阵地，在教师方面，为了撑持门面，不能不拼凑几个较有学历的亲友来点缀外，其余的不是某某官长的姨太太，就是某某大绅的亲亲戚戚了。不管什么资历，随时可以编造上报。教师中便各有各的后台，互相排挤攻击，学校变成钩心斗角的政治场所。上课照本宣科，下课后饮茶打牌，校长为了保住乌纱帽，还要送几个名额孝敬教育科长和督学，所以公立学校教师实际人数与编制是不相等的，把繁重的教学任务压在几个教师身上。

会城镇如此，农村也不例外，虽然没有某某官长介绍他姨太太下乡教书，但校长多数是由乡保长兼任，每逢更换乡保长，都影响到教师的去留和教育经费的清发。当时整个社会情况如此，做教师的人那有几个能够专心教学呢！

在私立学校方面：根据国民党政府的规定，凡要开办学校要有适当校产，教学设备，校董会人员的名单及教职员履历等要列表报请县政府，经教育主管部门派员调查核实才批准开办的。但在人情大过天，财可通神的旧社会，找个社会名流，地方士绅做校董或校长，和有关方面应酬一番，就是没有什么校产没有什么教学设备，只租赁一间祠堂和购置一些学生桌椅、黑板等，也可以挂起招牌招生了。如西隅路的致用小学挂名校长黎昌，是城南乡长、参议员，城南一霸，与学校毫不沾边。开办学校成了光复后新的生意门路，因而有独资和合股开办等形式，校长是老板，教员是股东或伙计，学生成了顾客，所以人们称之为“学店”。当时为什么有这种现象出现呢？就是因为那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出路困难，有的没有什么适当的工作可做，但又不想坐在家里吃闲

饭的，于是约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开起“学店”来。

这些以独资或合股开办的私立学校，在数量上是比那有经费来源的多得多，因它全靠收学费、杂费来维持，就要千方百计使学生人数多，自然也要讲究招徕术，竞争招生。当每个学期招生开始，便大登广告，遍贴街招，派出教员对家有学龄儿童的亲友上门拜访，拉关系，讲交情，邀请将他们的子女报名入学，甚至可以降价以求。对学生的学习不敢严加约束，怕得罪学生，失掉顾客。

另方面那些老牌的私立学校，也各有一套招徕学生的方式。有的工于装饰门面，注重形式，图表满壁。适当时期搞些学生成绩展览会或某种活动，邀请学生家长及街坊人士参观，吸引家长们对学校的信任。有的专以搞好学生队伍游行行列，遇事大出风头，使官场上和群众们感到该校纪律好。如崇实小学校长林日章是很典型的，每逢节日游行，或长官上下任，他必定亲率穿着整齐校服的学生，高举校旗，打鼓鸣号，吹哨操步，环绕会城主要街道一周，有时遇雨也是坚持的，林本人是擅长打铜鼓，吹乐号，设备鼓乐比其它学校多，经常以此训练学生做招徕的活广告。又有的为迎合有些家长要求严格教育自己子女的心理。本着“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对学生一味施行严格管教，认为儿童无自立能力，必须进行强迫学习，不讲儿童心理，因材施教，启发学生主动学习。以考试压学生，要默写背诵，对懒惰顽皮的甚至实行体罚，学生有的消极反抗逃学，有的暗中戏弄老师。当时报纸就有文章抨击，结果仍是取用这些方法。有位教学十多年的谭老师曾公开对人们说：“若是不打学生就不算是好老师”。事实上那时社会有的家长是赞同这种管教方法，它有它的市场。又有一种如殷浦学校，不设初小专收五年级

以上的学生，收费也较高。吸收的学生是以从事小工商业及华侨子弟为对象，迎合那些希望子弟在成年以前，能学得写好几个字，会写信，会记账便出来谋生或等候机会出国的父兄心理。学课也着重教古文、珠算、习字以及一些史地常识。同时也取用严格管教的教学方法。该校的学生人数不少，它是以老招牌取胜的。

私立学校由于一切开支，都是靠学费、杂费收入，少用一分钱就是校长多赚一分钱，势必形成商业化，学生返学校就是上课，做习作，什么课外活动，图书仪器、体育设备等都没有。华英小学把几个班级几十个学生集中在一个课室内，除了上课就是放学，连个活动场所也没有。那时如果设有乒乓球台、几本图书、简陋排球场，算是一流的了！

三、经济贫困 生活动荡 政治迫害

抗战胜利，并未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接着而来的是银纸贬值，物价飞涨。教师待遇微薄，生活直接受到威胁。为求得生活安定，也向政府效尤征收实物，出现了“以米代薪”的办法，将学费改收学米。学米的起源于抗战期间，由于粮食恐慌，社会人士和学生家长，在不使教师挨饿的诚意下，送些米给老师，初名敬师米。胜利后先在公立小学由借学米进而征收学米，后来推行到中学。一九四六年广东省视导团黄范一来新会视察时，认为教师待遇微薄，允许各校征收学米，这就成为合法的制度了，连向来免费的师范，农商职业学校也征收学米。私立小学也同样照收了。

征收学米数量不统一，公立小学低年级30司斤，高年级40司斤，私立小学较高些，杂费也是以学米计算的。这就给学生家长加重负担，社会议论纷纷，因此所谓民意机关新会

县参议会，在四八年三月第四次会议作出决定：①确定私立小学征收学米每学期不得超过60司斤，教师米津不得少于200司斤（高中收学米140司斤，杂费35司斤；初中学米120司斤，杂费30司斤；农职及简师40司斤，杂费30司斤）。②严禁学校滥收杂费；③统筹乡保学校经费事项交县政府执行。但官场积习，总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不实，故参议会此案，仅是一纸空文。

私立学校收学米总是比公立高些，一般家长多愿送子女入公立小学，但学额有限。当时保国民学校教师月领150司斤，校长190司斤，中心国民学校略高些。私立小学待遇较公立高，一般是200—400司斤，较优厚的达到600多司斤。公立小学经常闹欠薪，会城保国民学校四八年一二期各校经费还未有解决，四九年又欠薪达2—4月。各校征收的学米只能够分发三四个月教师的工资和支付杂费。到四九年七月镇教育经费管理委员会，才将发霉的稻谷2700多司斤平均分发给各保校，也只是杯水车薪而已。

经费是教育事业的命脉。会城镇办学经费的校产有田500多亩，铺业四间，庙宇八、九所（投承收入）每月收入是不少的，统归会城镇教费管委会支配，而使教师枵腹从公，是令人费解的。那时外海中心学校教师曾向社会发出呼吁要求清发欠薪，如不解决将停课待命，可见城乡公立小学教师的命运也同一样。会城有的私校如平山、文懿、象泉等校有祖尝田亩或铺租收入做校产，经费充裕、设备也较完备，待遇较好，聘请教师要求较高，教师们总想托人拉关系挤进去，所以那时有句笑话，学生“走公”，教师“找私”了。

在旧社会当教师虽然这么清苦，但那时要找份当教师的职业也不容易，每年寒假和暑假，是教师的两个难关，聘请

教师通常是半年（一学期），也有一年的。若在寒暑假前接不到关书（聘约），或学校当局没有口头通知，下学期就接近失业的边缘了。寒暑假是教师们苦恼的日子，整天为下学期吃饭问题而彷徨焦急。

大南路的大众茶室，是教师的职业介绍所，农村请教师到这里找人搭线，被聘请做主任或教师的也去那里找“拍挡”。那时城市难找职业，农村也不容易。每年教师来源都有增加：①因经济困难而停学的大中学生，找职业多向当教师这条路走；②机关被裁人员，一般是知识分子，做生意无本钱，干坏事无胆量，也只有走教师这条路；③没有能力升学的应届高初中毕业生，又挤到教师队伍中来。因而教师经常处于粥少僧多状态，没有人事关系难找到一份职业，就是领有甲种登记证，又有十多年教龄也不容易找到吃饭的位置。社会上曾出现锹墙脚，顶烂市，抢饭碗，索取介绍费（有的预付一月工资，有的讲明数字按月缴交）等情况。教师待遇现已微薄就更加微薄了。

但新会教育局，却借甄别小学教师的质素的名目，举办过两次全县小学教师登记，作为发财的机会。较严重的一次是抗战前的陈济棠时代。按规定要有师范学校毕业证书，或初中毕业要有三年以上教龄才能合格当教师，领取正教员登记证。未满三年教龄的只能领代教员登记证，待遇较低，没有登记证的不得聘用。为了取得合法的资格，教师想方设法托人借，拉关系向有关学校要求填写聘书。而通过教育局这一关却不容易，但财可通神，教育局有计划大开方便之门，县督学赵××等人（姓名忘记），和会城几间小学有默契，如有元代人“伪造关书”等校，若持有该校的聘书，加上两三个“电光炮”（白银10元卷起来等于电光炮这样大），

就可以领到正教员的登记证了。

经过这次的甄别登记，全县小学教师大多数是正教员，教育局的“收获”也不少，所谓清水衙门的教育局也有油水捞。我是乡村师范毕业，初次当教师是教育局长陈恒业的侄陈子明介绍，没有使用“电光炮”，可是逢年过节送礼孝敬是免不了的。

第二次教师甄别登记约是在一九四〇年，那时县府半壁河山，政令能达到的只有几个区，要找人来登记也难。笔者那时不要再登记，没有听到什么敲竹杠事的传说。

女子当教师更困难些，一间完全小学只有二三名女的，农村小学会更少些。不论女的学历资历怎样，总是同工不同酬，待遇是低于男性，也只能教低年级。还有不少苛刻的条件，如结婚的不要，有婴儿的不要，产假要自己找人代课等，什么男女平等，只不过是句空话而已。

在城镇当教师，会多受一层政治迫害，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进攻阶段，国民党加紧了法西斯统治，魔爪伸向教师，规定做教师的要有文官荐任以上（县长级），武官校官以上（营长级）的人来担保，试想教师怎能找到这样的文武官员来担保呢？后来新会县政府教育部门，改为由校长或主任和教师三人联名担保才能充当教师。（闻是中共地下组织设法提议改变的，）教师才松了一口气。

四八年五六月间，“新会县戡乱建国委员会”召开会城地区中小学校长主任座谈会，参议长黄槐庭在会上大声叫嚷说：“凡是青年教师，不嫌薪水低，工作积极肯干的要注意他的思想行动，有情况及时报告，否则后果由校长主任负责”（大意如此）、真是危言耸听。进步青年教师常以日间饮茶、夜间打麻将的腐化生活来掩盖刑警人员的耳目（刑警

是县府的公开的特务组织，这班人屁股后面枪尾突出，胸前卸开衫纽，凶神恶煞，受县长直接指挥）。

四九年五六月间，新会桐井乡小学校长梁衍文，青年教师李尧被刑警以莫须有的“通匪”罪名被抓走。不久又传一中、三中有些师生投奔解放区的消息，教师处于白色恐怖下生活，老教师鲁家铨要找国民党新会县党部秘书林瑞尧担保，才能继续留在外海任教，四九年七月间，作者接受平山学校聘书不久，当时新会县长张寿对平山校长李钦说：“李达生此人有共匪嫌疑，不能聘用”。后经过《民权报》总编辑施见三讲情，广东省参议员许约之的担保，弄得亲笔信给平山校长证明，才免遭危险，离开学时间只差几天了。

四、团结起来迎接解放——会城小教 联谊会成立前后

解放前新会有教育会的组织，但根本不代表教师们的利益，而是国民党和政府的御用团体。抗战胜利后，教育会举行过一次教育会议，那是为了选出教育界的县参议员。参加的教师是先由国民党圈定的几个人，会议期间以请吃饭、饮茶为手段，公开拉选票，最后选出曾任国民党新会县党部书记长、三青团新会分团筹备主任并任新会一二中校长的赵鼎勋来充当（后来当上付参议长）。会城的教师参加选举的人很少，因大多数都不是会员、作者有十多年的教龄，且领有甲种公职人员登记证，还取不到教育会员的资格。

这位从教育界选出来的付参议长，几年来没有为教师做件好事，教师被欠薪威胁到生活这重大问题，也没有代表教师们讲过一句话，提出合理的要求。当了官做老爷，怎还想到教师生活的苦况呢？

社会的现实生活，擦亮教师们的眼睛，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派的真面目，新会地下党组织，针对当时教师的思想情况，为了提高教师们的思想觉悟，认识生活及出路只有依靠自己，团结起来才有力量，通过葵风小学为基地，把附近私立小学如文懿，象泉，平山，侨光等校教师串联发动，进行每月一次轮回参观访问叙餐联欢等活动，把会城绝大部份私立小学教师团结起来，打破过去文人相轻，同行相妒，互不往来的局面，出现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的新气象。一些教育界老前辈李钦，莫荣坊，李子韶等人，也和教师们一起参观活动；队伍逐渐壮大，都认为有进一步组织起来的必要。四七年教师节的一次联合叙餐活动中，有69人参加，除会城私立小学教师外，还有外海五昌等校教师。来宾中有县教育科长赵梅友（中共党员）、督学汤梦畴。陈仲衡，何达云也以葵风校董名誉参加、连没有邀请的国民党新会县部常务监察委员区澧泉也来参加（来意不明）在庆祝会上通过成立会城小学教师联谊会筹备委员会（简称小教会）。选出平山校长李钦为筹委会主任委员，委员有陈东（葵风），李达生（文懿），陈如松（象泉）、陈柏坚（侨光）莫荣坊（崇真）等人，会址附设在平山小学内。选举前区澧泉站起来发言，讲一番支持组织小教会的道理，并说千万不要选我的话，当时教师议论纷纷，说这是毛遂自荐。后来有不少人投他一票而当选。

筹委会开过几次会，讨论组织章程，并向新会县府办理申请备案手续，李钦校长为小教会的事付出不少时间及精力、四八年一月四日，在平山小学礼堂举行成立大会、开会有99人，外海，崖西等地都有教师参加，通过章程及入选名单，仪式隆重、并在一中后楼拍照留念。

可是小教联谊会成立一年多时间，经过三位县长——由

汤灿华、李务滋到张寿，都没有得到正式批准，只说新会有教育会的组织，不应再组织小教会，但也没有明令取缔。小教会的活动一直到解放。

四九年四月间，解放大军南下，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新会处于黎明前夕，在白色恐怖，特务横行期间，中共新会地下组织出版的小型宣传刊物《新锋》，经常通过邮局寄到各学校，教师们秘密地互相传阅，对形势有所认识，对前途也充满信心，大家私下谈话中都渴望新会早日解放。

四九年十月，中共新会地下组织通过解放同盟做好迎接解放新会的工作，小教会部份人员集中到侨光小学，在夜间赶写标语，缝制五星红旗等工作。

四九年十月廿二日清晨，鲜艳的五星红旗先后在葵风、平山等校升起，接着大新路新新茶楼和百吉鞋店，长安药店、文明书局等商店都悬挂起五星红旗，同时主要街道出现署名解放同盟的庆祝新会解放的标语、一夜之间，会城换了人间，路上行人都以惊奇喜悦的心情，迎来会城新时代的来临。傍晚小教会大批教师集中在知政南路口，手执红旗，燃放鞭炮，高呼口号，热烈欢迎中共新会武装新生连部队由江门乘卡车开进会城。

这时，小教会成员，仍坚持教学工作，还抽出人力进行劳军，支前，宣传等工作，各校师生组织晨呼夜喊队，分区分片早晚在大街小巷巡回高呼口号鼓舞人心，会城小学教师和各界人士一样，为迎接会城解放，巩固民主政权出过不少力量。

四九年寒假，江会军管会在江门缅香中学（现紫茶小学），举行小教冬学班，会城小教会骨干成员大都参加，初步接受革命理论学习，四九年十二月廿五日，新会县民主教师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参加的有中小学教师121人，接着会城教联会及各区教联会相继成立，领导着县和区镇教师进行理论学习，思想改造，参加各项政治活动，会城小学教师联谊会胜利地完成历史任务。

抗战前后的新会县民众教育馆

何 季 饬

一九三二年，广东教育厅为培养民众教育专业人材，举办广东省民众教育人员训练所，训练期限一年，办了两届，招生简章声明毕业后由教育厅分配原籍任民众教育馆长或图书馆长。我考上第二届于一九三四年秋毕业，持省教育厅的分配“指令”返新会去见县教育局局长陈恒业，陈推说：“我这个局长有职无权，你可直接问县长。”我转而找县长黄槐庭，黄避不见面，只派一代表答复说：“新会景堂图书馆是私立的，县府无权委派馆长，县立民教馆馆长是县党部常务执行委员兼任的，目前不能给你安置。”黄槐庭是当时统治广东的陈济棠手下文胆林翼中的宠儿，自恃后台硬，不把省教育厅的“指令”放在眼内；且不久，厅长谢瀛洲调任省高等法院院长，新任厅长黄麟书不管前任之事，不肯督促新会县府执行“指令”，故我往返江、省多次要求依章分派工作都没有结果，变成“毕业即失业”。

在我返邑交涉分派工作期间，考察新会办了哪些民众教育事业及其概况，写了一篇通讯稿《新会县民众教育馆巡礼》，于一九三四年底刊载在广东省民众教育馆编印的《广东省民众教育月刊》上，指出：新会本是一等县，自古文风甚盛，乃是文物之邦，人才辈出，但现时教育事业反而十分落后，尤其民众教育事业更加贫乏，除了私人办的江门电影院、江

门戏院、会城戏院各一间及景堂图书馆在全省中可列入第一流外，公立的只有一个运动场（冯平山出资建）和一间民众教育馆，但这间民众教育馆有名无实；该馆设在会城闾邑书院前座的一角，面积仅约三十来平方米，每月经费只有一百元，有馆长而无馆员，只雇一个“杂差”看管，馆内摆设为数不多的书籍及几份报纸杂志；我在该馆停留三个钟头阅书，见该馆真是门堪罗雀，到来阅览的不足十人，亦未闻该馆平时举办过任何应办的教育活动，只可勉强称为阅书报社而不应挂“新会县立民众教育馆”的招牌。

这篇稿纸是用“江殿庐”的笔名，我不敢出真名是怕黄槐庭看了会报复打击。果然，通讯稿发表后，黄十分恼羞，一九三五年春派县府秘书张宝荣到广东省民教馆联系追查投稿人，遭月刊编辑拒绝。

一九三四年春，广东省立民众教育馆建成开放（位于广州解放北路，即今之广东迎宾馆大院内），谢瀛洲自兼馆长，副馆长为省教育厅第四科长雷鸿坤兼任。经过一年举办过各种展览会、演讲会、音乐会、比赛会、话剧、粤剧、京剧公演等活动，江亢虎、谢瀛洲也曾在该馆大礼堂讲过学；张宝荣奉命赴穗追查投稿人时参观该馆，返县府复命顺便向黄介绍省民教馆的各项设施内容和活动情况，黄是爱出风头之人，以为也可以象谢瀛洲那样借民教馆的场地来表现一下自己的“才华”，兼之省民教馆刊物揭露新会县当局不重视发展民教事业，亦有必要设法补救以挽回面子，因而接受张宝荣的建议，同意拨款扩建县立民教馆，更名为新会县立第一民众教育馆，以示将来还会开设第二、第三间民教馆之意；张宝荣乘机树立自己势力，推荐当时在县立一中教务主任的叶耀衡当馆长。

这里顺笔一提，与此同时张还分别推荐何国琮继黄敏之任县立一中校长、叶恭信任县立冈州中学校长；两叶一何均在中山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毕业，是张的新会一中旧同学，但冈州中学校友及学生多数自发地反对叶恭信接任，实行罢课，要求县府收回成命，让德高望重的李淡愚先生继续长校，学潮闹了多天，街头有海报、报纸也竞相报道学潮新闻，搞得黄槐庭、张宝荣、叶恭信等狼狈不堪，十分被动，最后，还是赖李淡愚先生劝导学生以学业为重，恢复上课，叶恭信才得勉强到校履新。

一九三五年六月叶耀衡受委后，首先与县府商定民教馆经费是每月省毫券一千元，馆址仍设在会城闾邑书院原址，但扩大面积范围包括正座头进二进全部及偏间，其次是组织班子，张宝荣指定要聘广东国民大学法律系刚毕业的李鹤年、罗荣恩两人为馆员，因张宝荣认为自己只是中学毕业，要升官就非得设法弄一张大学毕业文凭不可，因此报名读广东国民大学，请李、罗二人在广州上课时代他签到，故叫叶聘李、罗任馆员以示酬劳；张还荐一中毕业的旧同学邝其焕任馆员；教育局长陈恒业（云楣）也指定要聘其侄陈子垣及女婿张其光两人为干事，张其光在广州读大学，住在广州，不可能天天来会城民教馆上班，只每月从省城返乡一次领乾薪四十元，我不懂其中奥妙，总觉得不顺眼，有人暗中劝告我：“军队和政府机关、学校、团体吃空额的现象多了，何必大惊小怪，你还是以少管闲事为佳。”在旧社会，教育经费已经少得可怜，再加上当权人物安插私人，滥竽充数，甚至竟出现吃空额，又怎能办得好教育事业呢？叶自己也任用三个干事，一个是原在县一中任教务员的刘侠云，负责写美术字，宣传画和抄录，一个是李××（县一中初中毕

业生，)管理图书报纸杂志，开会时与陈子垣一起负责维持会场秩序，一个是叶×椿，是叶的哥哥，负责财务庶务，另外还雇一个勤杂兼厨务；可能叶考虑到这班馆员、干事没有一个受过民众教育训练，因此专程到广州请省民教馆秘书徐锡龄(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历任勸勤等大学教授)介绍民众教育人员，徐是我在省民众教育训练所读书时的老师，通过徐的推荐，叶聘我任馆员，是年七月共同开展筹备工作。

叶耀衡参考省民教馆的组织结合新会第一民教馆的经费定额，定出编制和薪给：馆长叶耀衡一人，月支一百元，综理全馆业务；下设语文教育，公民教育、生计教育、康乐教育等四个股，由四个股员分别担任股主任；李鹤年任公民教育股主任、罗荣恩任康乐教育股主任、邝其焕任生计教育股主任、何季镗任语文教育股主任兼书记(文牒)，各月支五十五元，干事五人各月支三十五元至四十五元不等，勤杂一人月支二十五元，全馆员工二十一人，薪金一项占经费55%，剩下的四百多元便是事业费和办公费。在当时，新会县府欠发县立各中小学教职员工薪金达半年之多，唯独对第一民教馆从三五年七月筹备至黄槐庭三六年九月去职的一年多时间里，筹备开办费及每月经常费都依时发放，从无拖欠扣减，可能是一因第一民教馆新成立，二因张宝荣及陈恒业都安插了私人，便从中给予特别关照。

三五年七月民教馆开始动工装修，头进左便分设图书馆(有图书千余册)、书报阅览室，右边分设办公室、问事代笔处、法律顾问处、会客室、员工宿舍，天井两廊分设馆长室、会议室、贮藏室，二进中间设大礼堂，摆设长椅数十张，可有百余座位，连企位可容纳二百余人，礼堂建一讲台(亦作舞台)及化妆室，礼堂两边分设生计教育陈列室。语

文教育陈列室、康乐教育陈列室、公民教育陈列室。

九月初筹备就绪，举行开幕典礼的当天，江门会城各报都报导开幕消息，民权日报总编辑施见三先生还亲自执笔撰写一篇祝贺社论；我们也预先印备《新会第一民教馆 答客问》小册子于开幕日散发，以问答形式，宣传民众教育的重要性和介绍民教馆的活动内容：

客问：什么是民众教育？

答：民众教育初名成人教育，又名平民教育，但成人教育、平民教育等名称都嫌稍偏，因为民众教育的主要对象虽然是成年人，但并不把少年儿童拒绝于门外；民众教育的主要对象虽然是文化水平低或没有文化的劳苦平民大众，但并不排除各阶层的人士，如学术讨论会就主要是知识界参加，故此定为民众教育或社会教育就较为全面恰当，它是以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互相配合，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建国必须建民，强民才能强国，民众教育旨在造就民众成为有知识、有技能、有道德和身体健康的国民。

客问：民众教育包括哪些内容？

答：孙中山先生说过，中国民众有愚、贫、弱、私四大通病，必须用教育手段医治四大通病才能富民强国，抵御外侮。因此民众教育包含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康乐教育、公民教育。针对四大通病，以语文教育治民众之愚，生计教育治民众之贫，康乐教育治民众之弱，公民教育治民众之私。

客问：民众教育馆今后计划办哪些事业和活动？

答：本馆现设有语文教育、生计教育、康乐教育、公民教育四间陈列室，展品将定期更换，并设有图书馆（欢迎来馆阅览或借出外阅读）、阅书报室（订有县内外报纸和画报杂志）问事代笔处、法律顾问处，每三天编写一次《时事述